

# 敦煌・民族・語言

SHIJI HANXUE LUNCONG

## 世界漢學論叢



〔日〕高田時雄 著  
鍾珮 等譯



世界漢學論叢

# 敦煌・民族・語言

[日] 高田時雄 著  
鍾 舛 等 譯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敦煌·民族·語言/(日)高田時雄著;鍾翀等譯.

北京:中華書局,2005

(世界漢學論叢)

ISBN 7-101-04717-3

I.敦… II.①高…②鍾… III.①敦煌學—文集

②少數民族—文獻—研究—中國—文集

IV.①K870.6-53②K2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63375 號

- 
- |      |                                                                                                                             |
|------|-----------------------------------------------------------------------------------------------------------------------------|
| 書名   | 敦煌·民族·語言                                                                                                                    |
| 叢書名  | 世界漢學論叢                                                                                                                      |
| 編著者  | [日] 高田時雄                                                                                                                    |
| 譯者   | 鍾翀等                                                                                                                         |
| 責任編輯 | 柴劍虹                                                                                                                         |
| 出版發行 | 中華書局<br>(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zhbc@zhbc.com.cn |
| 印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
| 版次   |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br>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規格   |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br>印張 15¼ 字數 350 千字                                                                                     |
| 印數   | 1-2500 冊                                                                                                                    |
| 國際書號 | ISBN 7-101-04717-3/K·2020                                                                                                   |
| 定價   | 36.00 元                                                                                                                     |
-

## 目 錄

## 第一章:總說

|                           |    |
|---------------------------|----|
| 敦煌發現的多種語言文獻·····          | 3  |
| 漢語在吐魯番——以《切韻》殘片研究為專題····· | 21 |

## 第二章:漢藏資料

|                             |     |
|-----------------------------|-----|
| 藏文音譯《寒食詩》殘片·····            | 47  |
| 藏文書寫阿彌陀經的跋文——漢藏對音資料年代考····· | 62  |
| 雜抄與九九表——敦煌藏文字使用的一個側面·····   | 79  |
| 藏文社邑文書二三種·····              | 86  |
| 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事業的藏文資料·····       | 100 |
| 北京藏敦煌寫卷中所包含的藏文文獻·····       | 124 |
| 吐蕃期敦煌有關受戒的藏文資料·····         | 140 |

## 第三章:回鶻字音

|                      |     |
|----------------------|-----|
| 回鶻字音考·····           | 159 |
| 回鶻字音史概述·····         | 185 |
| 回鶻字注音的吐魯番漢文寫本殘片····· | 204 |

## 第四章:其他

|                 |     |
|-----------------|-----|
| 于闐文書中的漢語語彙····· | 213 |
| 敦煌本《玉篇》·····    | 306 |
| 敦煌本《玉篇》·補遺····· | 318 |

## 2 敦煌·民族·語言

---

|                             |         |
|-----------------------------|---------|
| 五姓說之敦煌資料·····               | 328     |
|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之語言與敦煌寫本之性質 ····· | 359     |
| 可洪《隨函錄》與行瑫《隨函音疏》 ·····      | 386     |
| 莫高窟北區石窟發現的《排字韻》割記 ·····     | 459     |
| <br>專名等索引·····              | <br>469 |
| 論著索引·····                   | 478     |
| 後記·····                     | 493     |

# 第一章

## 總 說



## 敦煌發現的多種語言文獻

### 導言：漢代的敦煌郡

位於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唐代稱沙州，和瓜州（西安）、肅州（酒泉）、甘州（張掖）、涼州（武威）等綠洲地區成為與中原交流的重要通道。它是連接中國通過西北絲綢之路聯繫西域的咽喉，不難想象，古時來自西方講着各種印度——伊朗諸語的人們匯聚於此。“敦煌”一名，早在托勒密的《地理指南》中即已出現。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時於敦煌西烽燧下發現的那些寫成於 4 世紀的粟特文“古信札”中，敦煌被寫作  $\delta r w \tilde{n}$  [Thurwan]，但難以確定該名源自何種語言。有此事實不能忽視，“敦煌”很可能是漢語以外的其它語言地名的音譯。

這一地區曾居住着月氏人（吐火羅人），漢文帝時（公元前 179 公元前 157 年）因受到匈奴的襲擊而西遷。公元前 2 世紀末，漢武帝發動了對匈奴的戰爭，不僅將匈奴人逐出河西走廊，而且有效地控制了河西綠洲地區。據記載，此時敦煌地區開始設郡。“敦煌”一詞在漢語中的出現即始於這一時期。該地區歸漢後，歷經興衰，但即使在漢朝衰落時，也仍為漢朝的轄境。所以，敦煌最重要的語言無疑仍是漢語，漢語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社會上都佔居於主導地位，從這一點看，敦煌的語言環境與其它中亞綠洲地區截然不同。我們將在以後對敦煌所講漢語的特徵及變遷進行探討。



關於粟特語“古信札”的時代，學術界衆說紛紜，我贊同格勒奈特和西姆斯·威廉姆斯最新的研究結論<sup>①</sup>。在歷史上，敦煌地處東西交通孔道，地位重要。向東與河西走廊的肅州和甘州相連，西接哈密，連通吐魯番盆地，又是通往天山地區的跳板，在新疆境內分爲南北二支，其北居住着屬阿爾泰語系的游牧民族，多操突厥語與蒙古語。他們不時通過絲綢之路南遷，并定居河西走廊從事農業生產。此外，敦煌連接了今青海省境內的黃河上游地區。生活在黃河上游并建立過政權的吐谷渾人也與敦煌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將敦煌寫本中關於敦煌地區流行的語言狀況作一總結。由於敦煌文書多爲唐宋時代遺物，故我們的研究也受其制約，只能將重點放在包括吐蕃、歸義軍統治時期在內的唐朝及以後，而 11 世紀後半期敦煌進入西夏統治時期的語言狀況則不包括在內。另外，我們主要取材於寫本，所以除了記錄文字，我們無法從其它渠道了解當時的語言狀況。

## 一、敦煌所見語言

### 1. 粟特語

敦煌烽燧發現的“古信札”是早期粟特人東遷時寫給他們撒馬爾罕的首領和親戚的。由此可見，粟特人很早就活動在河西，並與中原有貿易往來。根據池田溫先生的研究，天寶十載（751）的一份差科簿中出現有從化鄉，居住着粟特人<sup>②</sup>。他們的聚落大概位於敦煌東部。這一聚落建於初唐，於 8 世紀下半葉被漢族文化同化并消失，時值吐蕃統治時期。敦煌文書中有粟特語寫本 50 餘

件,主要是佛教經卷,可能是居住在從化鄉的粟特佛教徒遺留下來的<sup>③</sup>。但即便是粟特人消失了,粟特語在九—十世紀間(歸義軍時期)仍在使用。這就是所謂的突厥化粟特人(Torco - Sogdian),同時那些回鶻化的粟特人或受到粟特語影響的回鶻人也可能講粟特語。這些經歷了回鶻化的粟特語文獻含有會計文書、信件和各種雜寫<sup>④</sup>。10世紀于闐使節張金山出訪敦煌,在他的一份于闐文寫本上用粟特語簽名,這一事實說明在這時期粟特語仍在一定範圍內使用<sup>⑤</sup>。

## 2. 于闐語

敦煌藏經洞中發現了百餘件于闐語寫本。所有這些文獻都用晚期于闐語寫成,除佛經外,還有相當數量的世俗文書,諸如外交書信和報告等<sup>⑥</sup>。于闐位於塔里木盆地南部,主要居民屬伊朗血統,距敦煌如此遙遠,其文獻却頻見於敦煌,其中必有緣故。于闐語文獻在敦煌的出現,應與曹氏歸義軍政權與于闐的和親政策有關。10世紀時歸義軍政權掌握在曹氏手中,他們通過與于闐皇室聯姻而確保二者間的密切關係<sup>⑦</sup>。再者,唐高宗曾在于闐設立毗沙都督府,到8世紀末吐蕃佔領前,于闐一直處在唐朝的有效統轄之下,它所推行的管理體制與內地一致。因而,于闐有漢族血統的人不少,中原傳統文化對他們有極深的影響,可視作于闐與敦煌發生密切聯繫的原因之一。曹氏歸義軍時代,所有前往中原王朝的使節必須經過敦煌,不僅僅是一些常規外交活動,令人驚奇的是還有一支常駐敦煌,從事外交活動的于闐人團體。他們精通漢語,并以于闐文轉寫漢語佛經<sup>⑧</sup>。與此同時,還發現有為方便于闐人來往於敦煌而編輯的記載大量口語詞匯的于闐語—漢語雙語寫

本<sup>⑨</sup>。

### 3. 梵語

敦煌好像不應存在講梵語的社會團體。然而,印度和尚不僅活躍在敦煌,河西綠洲都有他們的足跡。特別是宋初,在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支持下,由於印度北部佛教受到伊斯蘭勢力的襲擊,出遊中原的印度和尚人數更有所增長。吸引他們來華的另一個原因,大概是五臺山這一文殊菩薩聖地吧。早在 1924 年,哈金發表了伯希和收集的梵—藏文對照表,這是曾赴五臺山朝聖的印度和尚 Devaputra 於 10 世紀後半期在肅州口授而成<sup>⑩</sup>。這些印度和尚使用的是梵語,令人奇怪的是敦煌寺院僧侶也在印度和尚的教導下學習梵文<sup>⑪</sup>。此外有人推測早在吐蕃統治時,吐蕃僧侶就在敦煌開啓了學習古梵文佛經的先例。在敦煌出土的文獻中發現有在西藏編撰的《翻譯名義大集》(Mahāvīyutpatti)殘片(圖版一),說明這一寫本在吐蕃時期傳到了敦煌<sup>⑫</sup>。這為上述推測提供了證據<sup>⑬</sup>。10 世紀下半葉,隨着來中原的印度僧人的增多,自然與其交流的機會也增多了,于闐作為來華的必經之途之一,很多當地人為他們翻譯,充當中間人。此說基於一份梵文—于闐文雙語文本<sup>⑭</sup>,被熊本裕稱作《西域旅游者用梵—于闐語會話練習簿》<sup>⑮</sup>。該手冊似乎是與一位印度和尚在來華途中合力編成的,其目的地是五臺山。

### 4. 回鶻文

為了保持這一地區的正常貿易,曹氏歸義軍政權(10 世紀)恰如他們與于闐的貿易一樣,不止一次地與甘州回鶻實行和親,並力圖與甘州回鶻保持良好關係。也許由於這種關係,一部分回鶻人

得以留居敦煌。11 世紀時，受西夏擴張的脅迫，大批甘州回鶻必然向西邊的敦煌遷徙。同時，西回鶻也有人向敦煌一帶遷移，這一點也不容忽視。無論如何，大批回鶻人的遷入逐漸將曹氏政權演變成傀儡政權，進而控制了敦煌。曹賢順於 1014 年派使訪遼，即被稱作“沙州回鶻”，可見敦煌此時已易權於回鶻。基於這一歷史背景<sup>⑬</sup>，自 10 世紀下半葉起，敦煌地區回鶻語的使用理應呈現劇增態勢。它的影響可與漢語相匹敵，並最終超過漢語。然而藏經洞出土的大約 50 件回鶻文寫本中儘管含有佛經、占卜、格言警句和書信<sup>⑭</sup>，但無論怎麼講都不能算多。或許有人認為這是當時回鶻文在回鶻中並不廣泛流行所致。也有可能，洞中對文獻的收藏有偏向性，至於原因究竟何在，尚待考證。但它說明追溯語言史單靠文字材料是不够的。敦煌還存有大量出土於其它洞窟的元代回鶻文文書<sup>⑮</sup>，茲不贅述。

## 二、漢藏語言之共存

### 1. 吐蕃統治時期的影響

上文我們簡略地概述了敦煌地區使用語言的情況，除回鶻語根據現有材料無法確定其流程度外，對敦煌語言有着根本性、持久性影響的當首推藏語。因為吐蕃在 786—848 年間對敦煌實行軍事統治，敦煌百姓不可避免地生活的各個方面接觸到藏語。既然統治者使用藏語，不難想象各級政府機構也在使用藏語。中原與藏的官方交往中翻譯顯得日益重要，藏語在敦煌的漢族百姓中也自然流傳開來。同時，在起草官方文書時，吐蕃也任用漢族官員。這一推測可從以下事例得到證明：敦煌文獻中吐蕃時期的雜

寫經常與官方行政文書的開頭一致，有的契約文書是漢人却用藏文，而漢文文書却常常是吐蕃文的落款<sup>19</sup>。

再者，吐蕃語名詞出現在漢語文書中一般認為始於吐蕃統治時期。不僅僅那些難譯的像乞利本、節兒這樣的官名和諸如悉董薩、曷骨薩的部落名稱<sup>20</sup>，而且像“洛易”對應藏語中 lag yig（指印）都在漢語文獻中出現過<sup>21</sup>。相應地，在藏語文獻中也有更多的漢語專有名詞出現<sup>22</sup>。敦煌文獻中有幾件藏—漢詞彙表的殘片，這為漢—藏語對譯提供了必要的工具。S. 2736 和 S. 1000 吐蕃文寫本和 P. t. 1263（P. ch. 2762）漢藏寫本都已為人熟知<sup>23</sup>，本文中所補充的材料是迄今被忽略了殘片（圖版二）和漢藏對譯“十二地支”（圖版三），這是日常所需的紀年工具。

9—10 世紀河西、中亞地區擺脫吐蕃統治以後，吐蕃語仍然佔有很高地位，並常作為外交語言<sup>24</sup>。上述的于闐—漢語文獻中，有一件寫本即有漢、藏短語而且還用于闐語對藏語作了解釋，表明這一卷子是于闐人使用的<sup>25</sup>，同時也顯示了 10 世紀藏語的國際地位。

## 2. 佛經抄本

吐蕃贊普棄宗弄贊（815—841 在位）執政期間<sup>26</sup>，下令在西藏和其統治下的敦煌開展大規模抄經活動。這一活動涉及了近千人。所抄經卷主要是藏文的《Tshe dpag tu me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與其漢譯《無量壽宗要經》以及玄奘所譯漢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藏》第 220 號）與其對應的藏文《Shes rab kyi pha rol tu phyin pa stong phrag brgya pa》。寫經生與校勘者的名字常附在抄本之末。漢語寫本自然由漢族人來抄寫，值得注

意的是，從名字上看，抄寫藏文經卷的大部分也是漢族<sup>27</sup>。從敦煌的人口比率上看，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個前提，這些漢族人應對藏文寫本有充分的了解并能抄寫藏文佛經。反之，許多漢族人通過抄寫佛經而掌握了藏文。無論如何，由於吐蕃政權採用強制手段來抄寫佛經<sup>28</sup>，藏文寫本遂逐漸滲透到敦煌漢族社會中，不管他們願意與否。當抄寫《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藏文譯本時，寫經生會收到一張與抄經紙一般大小的紙，稱作 *glegs tshas*，它是否意味著襯墊或是保護經卷乾淨或其它初衷尚不可知，但是它可以辨認出來，因為持有者常這樣寫：“這是 Bung Tse - weng 的 *glegs tshas*。”(P. t. 1155)。這些 *glegs tshas* 上用藏語寫有信件的開頭、借據等諸如此類的短語，說明那些寫經生利用抄經的閒暇來練字。說明他們并非機械地照本抄經，而且熟知藏語。

除了這些政府規定的抄經活動，寺院也有小規模的抄經。在遺留的幾十件同樣版本的漢語《金有陀羅尼經》後用藏文簽名。其中的汜廣、張寺加<sup>29</sup>和鄧英子這樣的姓名也出現在漢文、藏文版的《無量壽宗要經》的寫經生名單中。另外，其中的五件寫本有“三界”的字樣，說明在政府發起抄經的同時三界寺也有抄經活動。值得注目的還是抄寫漢文經卷時他們仍用藏文簽名。

### 3. 寺院

這一時期佛教支配着精神領域，吐蕃統治了河西後，藏傳佛教與中原佛教開始接觸、融合，這對於佛教的發展至關重要。研究藏傳佛教和藏語在寺院中的使用，要考慮到當時的社會狀況和佛教的影響。當時藏族佛教高僧法成(Chos grub)，俗姓“吳”<sup>30</sup>。他出生於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精通漢、藏語，寫了不少漢、藏著作并一

一對譯。他是敦煌佛僧中的大師，被稱為“三藏法師”<sup>③</sup>。他的弟子至少有一部分精通藏語是公認的，他的影響也同樣波及了俗人。P. t. 336 是藏文版的《如意輪曼陀羅》(Cintāmani - mantra)，卷末識語是“張 gtsug - legs 所寫”，但背面用漢字注明“宋判官經”，因而得知它屬於一位姓宋的漢人官員。

#### 4. 藏漢雙語群體社區的模式

吐蕃統治的影響達到極點即產生了藏漢雙語群體社區。敦煌的一部分漢人不僅僅通漢語，而且能流利地聽、說、寫吐蕃語。儘管不明其動機是使用藏語或為方便他們中的大多數使用藏語，這些“吐蕃化的漢人”形成了組織或社。不管何種動機，都反映出藏語已深入到漢人社會的基層——社，值得關注。目前發現有兩件用藏語記載社條的文書，其中一件(Ch. 73. xiii. 18)列有“社長”Dze'i - shi(齊施?)和十名“社人”(zha myi)，他們基本是漢人<sup>④</sup>。遺憾的是這一文書前半缺失，因而看不見全部社條，但保留的關於違反社條的處罰與漢文的社條類似。另一件文書(P. t. 1103)也有兩三個漢人名字。還有一些漢文社司轉帖，背面是藏文寫的納贈歷(P. t. 1102)。這也補充說明了藏文在社區中的行用。<sup>⑤</sup>

有關社區組織的藏語文書最早出現於吐蕃統治時期，但同時建立的漢藏雙語社區於歸義軍時期還存在<sup>⑥</sup>。這通過 10 世紀一份關於“五姓”算命法的藏語寫本可以看出，其中姓按五音度歸類<sup>⑦</sup>。這一以“五姓”為基礎的占卜表對非漢族或沒有一定漢化程度的人是没有用的，它是被那些受過藏語很大影響的漢人使用的<sup>⑧</sup>。像這樣的材料表明 10 世紀下半葉至少有藏語寫本的使用，從而可窺見漢藏雙語社區之一斑。

## 5. 漢、藏雙語文獻

吐蕃統治時期，隨着藏語、藏文在敦煌漢族社會的滲透，漸漸在漢人中形成了用藏文書寫漢語作品的習慣，於是一些漢文書用藏文轉抄下來。大體上有以下幾種：

佛經類：《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普門品》、《天地八陽神咒經》、《般若心經》。

曲子詞：《游江樂·泛龍舟》、《對明主·鄭郎子辭》（圖版四、五）、《寒食篇》。

問答集：《菩提達磨禪師觀門》、《大乘中宗見解》、《長卷》。

佛教徒頌詞：《道安法師念佛贊》、《南宗贊》、《辭道場贊》。

童蒙讀物：九九表、《千字文》、《雜抄》。

首先，從年代上講，這些寫本屬於吐蕃和 10 世紀的曹氏歸義軍時期。吐蕃和歸義軍時期的佛經寫本在音韻上明顯不同，由此可得出後文提及的推論。曲子詞大都寫在 glegs tshas 上，大概是吐蕃時期抄經所的寫經生為排解抄經的枯燥時自唱並寫下的。他們不過是隨筆所記而已。佛經頌詞是寺院和尚日常所用的。倫敦的《長卷》是最長的藏－漢雙語文獻，主要由問答集和頌詞組成，從內容和語音上看，流行於 10 世紀的寺院。吐蕃時期的佛教文獻只有經文而沒有此類反映僧人生活寫本，原因尚待探明。童蒙讀物中，如《雜抄》<sup>⑤</sup>，像曲子詞一樣記錄在吐蕃時期的 glegs tshas 上。同樣地，《千字文》（Ch. 86 II 背；不同於 P. 1046 注了音的《千字文》）屬於吐蕃時期。九九表則不同，其背面的藏文文書上有于闐使者劉司空的名字，顯然屬歸義軍時期。

這裏要重點說明的是，用藏文書寫漢語的傳統從吐蕃時期建



立一直延續到 10 世紀曹氏歸義軍時代。當時，吐蕃已被逐出敦煌，所有使用書寫藏語的政治壓力已蕩然無存。但是一種習俗一旦形成就不會容易消失，同時還應考慮這一傳統為沒有機會學習漢字的社會階層保留。然而，迄今還沒有說明這一點的材料。

### 三、敦煌地區的漢語

正如文章開首所言，敦煌自漢代起即為中原所統轄，而敦煌與中原的政治聯繫又常被切斷，於是敦煌一帶逐漸形成了地區方言。敦煌移民大都來自甘肅、陝西等周邊地區，因而這一地區的方言大體上屬於西北方言。事實上，在上述藏—漢文雙語文獻的音韻，就反映出唐代沙州漢語之西北方言特色。唐代，吐蕃統治之前，敦煌和中國其它地區一樣，應從習俗到制度上與中原一致。中央派來的官員應講長安正式的官方語言，學校的課本也應與長安的朗讀發音一致。因為，就地域上說，長安也屬於西北方言的流行地區。情形有一些複雜，但應該能推測出作為唐朝雅言的標準語言（特別是官方語言）不同於長安的方言。若在長安存在着這種差別，那麼官方語言與方言的差別在敦煌會更顯著。再者，即使敦煌方言（河西方言）<sup>③</sup>是大多數當地居民的母語，在一些官方場合其地位已無法辨認了。但是 848 年張議潮起義建立相對獨立的政權後，敦煌與中原的聯繫逐漸減少了，與此同時，敦煌方言的地位也相應上昇，出現於公共場合，特別是 10 世紀曹氏歸義軍統治時期，敦煌方言成為獨立的敦煌官方語言。吐蕃統治時期和歸義軍統治的早期用藏文轉抄的漢文寫本反映了長安標準的或類似的發音，歸義軍統治晚期的寫本則展示了河西方言的特色。由此可知在唐朝和